



逝去的虹影

現代人物述評

陳正茂/著

劉大杰	胡雲翼	左舜生	余家菊	何炳松	崔萬秋
侯 曜	廬 隱	譚慕愚	胡 適	常燕生	康白情
李金髮	王獨清	田 間	衛聚賢	費 鞏	蔣廷黻
丁文淵	顧孟餘	童冠賢	謝澄平		

現代中國學人文士的速寫，盡在此書！

逝去的虹影

現代人物述評

陳正茂/著

逝去的虹影 ——現代人物述評

作 者 / 陳正茂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楊尚蓁
封面設計 / 蔡瑋中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12 月 BOD 一版
定價：28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自序

2011 年正值民國百年，海峽兩岸都有紀念活動，大陸以「辛亥百年」為名，舉行不少場學術研討會，台灣這邊也有若干追念活動。一百年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尤其在憂患重重的現代中國，百年來經歷了辛亥鼎革、軍閥割據、列強欺侮、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兩岸對峙等滔天巨變，多少人物，幾多豪傑，在中華大地競逐；多少變故，幾許成敗，在華夏穹蒼下上演。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其實不管是五百年或數百年，在歷史長河下，甚多是「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無情時間的洗滌衝刷下，更多的是「俱往矣」！已不復存在或遭人遺忘。能真正接受歷史考驗或公評的，未必是曾經掌握大權的執政者、權傾一時的政治人物、雄霸一方的軍事強人；或富甲一方的豪門貴族。而是其所作所為，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對後世有所影響，如此，其人才算是「風流人物」。彩虹雖絢爛短暫，但畢竟為天空抹上一道美麗彩筆，滾滾長江東逝水，書中人物多已不在，但在民國百年史上，他們有如逝去的虹影，仍長留國人心中，是以《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為名。

自 2008 年出《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迄今，四年來筆者在秀威出了七本書，連同這本已是第八本。個人非常認同及佩服宋政坤總經理前瞻性的出版理念，倘無 BOD 這樣的出版方式，可能海峽兩岸諸多優秀作品，當無付梓之日，尤其可能無法激發作者進一步撰寫的慾望。畢竟所為之文，若無見天日的一天，多少是會令筆耕者意興闌珊的，至少筆者是如此。

當然也要感謝登山兄的拉稿與鼓勵，登山兄長筆者數歲，其著力於民國新文學作家及史料已近三十年，期間，無論是有聲之作的「作家身影」與「大師身影」；或其個人等身的著作，在兩岸三地都有一定的份量。而其一絲不苟的精神，獎掖後進的襟懷，以身作則的努力，都是筆者學習的榜樣。本書幾篇有關民國文人的文章，乃筆者仿倣登山兄的寫作風格而為的。四年出八本書，似乎也算多產，區區成績，均是登山兄的功勞，僅將本書獻給他，以誌提攜之情不敢或忘，是為序。

陳正茂 序於士林

100年10月26日

目次

自序	i
「世上方知有健兒」——劉大杰	1
國家主義文藝倡導者——胡雲翼	13
周旋國、共之間——左舜生	27
湖北才子——余家菊	43
廣義的「國家主義」份子——何炳松	57
何炳松「籌而未設」的遺憾——國立東南聯合大學 ...	63
閒話《江青前傳》作者——崔萬秋	69
遭日軍殺害的戲劇家——侯曜	77
曾經的青年黨員——廬隱	83
顧頡剛的永恆戀人——譚慕愚	87

交誼匪淺的兩位理性知識份子——胡適、常燕生	97
詩情與悲情——康白情	109
中國象徵派「詩怪」——李金髮	117
「創造社」詩人——王獨清	125
擂鼓詩人——田間	135
「胡說巴道」的漸大法師——漸聚賢	145
迷離失蹤的懸案——費輦	153
書生從政的典範——蔣廷黻	159
懷才不遇——丁文淵	169
從擁汪到投蔣——顧孟餘	179
從立法院長到第三勢力要角——童冠賢	195
第三勢力運動與《自由陣線》的初試啼聲 ——謝澄平	203

「世上方知有健兒」

——劉大杰——

「我輩江山非昔日，他人樓閣已多時。英雄自古皆窮士，君我而今更有誰！」、「海外飄零總我欺，城春國破少陵悲。今當世亂紛爭日，正是男兒破浪時。」、「草外輕風快馬蹄，金鎗獨自度東西。沙場一洒頭顱血，世上方知有健兒。」這三首慷慨激昂熱血澎湃之詩，是劉大杰在日本廣島贈與青年黨領袖曾琦的，詩歌之悲壯豪情溢於言表。

三十餘年前，筆者就讀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時，「中國文學史」為大二、大三必修課程。當時授課老師為林明德教授，指定課本為台大教授葉慶炳的《中國文學史》；必備參考書籍則為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版）。至於作者劉大杰到底為何方神聖，根本完全不知，老師亦未介紹，猜想可能因為其為大陸學者，在「白色恐怖」殘存的年代，教授怕麻煩也就不想多講了。爾後的學習歷程，筆者經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研究，而進一步引發對青年黨的探討，在二十多年鑽研青年黨的過程中，終於發現當年不知為誰的劉大杰，居然是隸屬於青年黨的知名作家，是國家主義派的文藝鬥士。

已故青年黨文化工作者陳善新（筆名柳浪），在其主編的《青年生活半月刊》第2卷第3期（民國37年2月1日）「文化公園」欄，曾對青年黨文藝作家作一「點將錄」的回顧。他說：「中國青年黨之前期文藝作家，有胡雲翼、劉大杰、田漢、唐槐秋、左幹臣、

袁道豐、何仲愚、宋樹人、李輝群、廬隱、徐懋庸、方敬、何其芳、姜華、魏思愆、侯曜、春暉……等人。後期文藝作家有張葆恩、左華宇、拾名、陳秋萍、辛郭、徐沁君、許傑、周蜀雲、田景風、王秋逸、王維明、王慧章等人」，此文證明大杰確實是青年黨員。人世間的事，冥冥中似乎有著一絲淺緣，讓筆者不僅憶起往昔，也興起為文介紹之念，現在就來談談大杰的生平及其「國家主義文學論」的主張吧。

劉大杰（1904-1977），筆名修士、湘君，湖南岳陽人，生於1904年（清光緒30年）。早年畢業於武昌師範大學中文系，與胡雲翼為同學並成摯友，兩人於1925年組「藝林社」於武昌，11月發行《藝林旬刊》，並刊行短篇小說《黃鶴樓頭》，積極提倡新文藝運動。大學畢業後，大杰遠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研究文學。學成歸國後，大杰歷任江蘇無錫中學國文教員、上海大東書局編輯、《現代學生》主編、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大夏大學及聖約翰大學中文系講師、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上海臨時大學文法科主任等職務。

1939年，大杰將其在大學講授之文學史講義，整理撰寫成《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於1941年出版；下冊於1943年撰畢，迄於1949年始付梓面世。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杰因抗日故，一度遭日軍拘禁。抗戰勝利後，1948年大杰出任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後升文學院院長。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杰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研究組組長、中文系代理主任。社會職務有「全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期間，將其畢生代表作《中國文學發展史》再度增修，分上、中、下三冊，於1957年及1962年兩次印行。1966年「文革」爆發，大杰以過去青年黨背景，曾受到嚴厲批判。期間，大杰又將《中國文學發展史》大加修改，於1973年修正版問世。

稿。《中國文學發展史》發行三十年來，大杰屢屢修補，可見其對該書重視於一般。

大杰除任教職外，亦兼《收穫》、《文學評論》、《上海文學》等刊物雜誌編輯委員，也曾任《中國文學批評史》主編。1959年春，大杰受聘為《辭海》編輯委員會副主編、編輯委員兼分科主編。1960年春，《辭海》修訂本初稿編寫完成，1962年印行試行本，1965年4月，《辭海》未定稿付梓。1979年2月，上海辭書出版社終於出版《辭海》定稿本，此時大杰辭世已兩年，離受邀編寫已二十載，可見編訂《辭海》工作之艱辛。1975年元月，大杰任中共四屆「人大」代表，晚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77年11月病逝於上海，享年74歲。

大杰一生著作等身，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均有可觀的成績，創作有：《黃鶴樓頭》、《支那兒女》、《盲詩人》、《十年後》、《昨日之花》、《渺茫的西南風》、《她瘋了》、《故事的禪子》、《三兒苦學記》、《一個不幸的女子》、《白薔薇》、《秋雁集》、《寒鴉集》。學術著作和評論集有：《春波樓詩詞》、《紅樓夢思想與人物》、《李義山年譜考證》、《魏晉人物思想論》、《東西文學評論》、《易卜生研究》、《托爾斯泰研究》、《德國文學概論》、《德國文學大綱》、《德國文學簡史》、《表現主義文學論》、《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翻譯有：《三人》、《苦戀》、《迷途》、《白痴》、《兩朋友》、《孩子的心》、《雪萊詩選》、《狂人與死女》、《戀愛病患者》、《俄國小說集》、《高加索的囚人》、《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雪萊的情詩》、《野性的呼聲》（與張夢麟合譯）等。編有：《明人小品集》、《山水小品集》和標點《袁中郎全集》。

歷來有關介紹劉大杰的資料，莫不說他隸屬「中國農工民主黨」，殊不知大杰早年與同窗摯友胡雲翼均加入過中國青年黨，且是宣揚「國家主義文學」的積極旗手。大杰早期的作品與國家主義文學觀，亦常常披露於青年黨的喉舌《醒獅週報》的「文藝特刊」

上。該特刊是繼承原有的文藝欄，加以擴充篇幅而成，初由黃仲蘇主編，內容多為個人的感懷抒情之作。特刊中除靈光、趾青、胡孟平等少數具有發揮該報所鼓吹的國家主義精神作品外，其他作品均與青年黨及國家主義無涉。一直到 1926 年 5 月以後，該特刊由胡雲翼與大杰二人接手後，內容開始有變。他們主張當時中國的時代環境，需要的是國家主義的文學，即寫實的形式，國家主義的內容，從而二人正式豎起國家主義的旗幟來談文學，同時二人所寫的劇本或短論，其國家主義的立場也明顯可見。

大杰在《醒獅週報》最早的文章為〈海角江濱〉一文，該文連載於 1926 年 6、7 月的《醒獅週報》第 87 及 90 號的「文藝特刊」上。文中敘述其赴日留學的途經之地，從家山的初別談起，說到江濱寄信予摯友胡雲翼，滬上宴會結識歐陽予倩、匯山碼頭的少女、長崎海岸、廣島灣畔的櫻花、比治山中、風雨的橫川，最後以寫給外祖母的平安家書告結。內容中最精彩的為，大杰深有感觸，遠赴敵國求學的無奈與悲哀，譬如提到廣島的櫻花，大杰即說：「不要因這裏的美麗的櫻花，就忘記了祖國。要知道這些鋪滿了櫻花的山野，都是住著侵略祖國的主人。祖國他有美麗的江山，他有清秀的郊野，千萬不要因為這裏的美麗的櫻花，就忘記了疲弱的祖國。」大杰深情的說：「月兒漸漸地昇高了，海水總是不住的狂鳴。岸上的櫻花，一層一層地加厚了。就在這個月夜的櫻花海岸，正站著一個悵望祖國天野的青年。」

接著，他提到遊比治山看見擊沈中國砲艇的鐵炮，明治天皇的行宮，感觸激動的說：「比治山，雄壯的高峻比治山！你在日本史上，得了無限的光榮，在我們的眼光中，已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最後，大杰有感而發「唉！今天走到這座山中，正好像是亡了國的高麗人一樣。親愛的祖國的同胞們，你們要走到敵國來，才看得出祖國疲弱的真跡。」

有趣的是，他從鷹野橋坐電車到橫川去找好友崔萬秋，崔萬秋告訴他一些關於人家戀愛的事，豈料大杰卻正經八百的說到：「我無論如何，不同日本女人戀愛。任我受終身的流離與孤獨，也不願同我仇敵談愛情。我們現在要看清我們的責任，要認清我們要走的路程。男女的愛情，在現在中國的環境壓迫下的青年，還不感著唯一的飢餓，我們這般青年最重要的責任，就要在這個『四面楚歌』的壓迫之下，把祖國救出來。」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國仇未報，豈能兒女情長，大杰滿紙的愛國血忱，正符合彼時「國家主義」的思想，而由其好友胡雲翼與崔萬秋均是國家主義的信仰者，推算其加入青年黨的時間，大概也是於此時。

1926年7月18日，大杰在《醒獅週報》第92號，寫了〈國家主義文學論〉，為其首篇闡釋國家主義文學之力作。文章開頭即痛批「中國現在的文藝作品，都成了一種脆弱的亡國時代的悲調。可以說希臘滅亡時候的哀音，送到了中國的現在。」其因何故？大杰說：「現在中國雜誌上面的小說與詩歌，差不多沒有一篇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作品。」他批評當時的文學界，多是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之作，不是寄情山水，就是歌詠愛情。殊不知「五卅慘案」的槍聲，段祺瑞「三一八慘案」的慘殺學生，但我們的作家卻只會每天寫點情詩；寄託於愛情，好像文學是要這樣才成其為藝術，好像不是描寫愛情的小說與詩歌，看了就不感興趣。

大杰以為這種歌情頌愛的作品，不限定是真的藝術。他舉托爾斯泰在《藝術論》書中說過：「這樣惟以傳達淫慾的悲觀的情感的作品，認為不是真的藝術。我們對於這樣的東西，不但不應該獎勵，並且應該驅逐和排斥。」而當時中國的文學界，即如托爾斯泰所說的，「惟以傳達淫慾的悲觀的情感的作品了」。因此大杰認為這樣的文藝，這樣虛偽的無用的文藝，在現在的中國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是應該要加以驅逐和排斥的。

隨後他話鋒一轉提到「本來談到文藝，是沒有含什麼主義的。她是超越階級，道德和一切的生活的表現。」不過時代和環境又和文學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時代，產生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環境，發生一個環境的文藝。某個時代需要某種文藝，假使這種文藝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時，大杰以為，我們的文藝作家，將責無旁貸的去努力追求。

大杰批判當時國內文壇，一些主張共產主義、和平主義、世界主義的文學思潮，他認為那些都是好高騖遠與不切實際的。他沈痛指出「中國既到了快要滅亡的一點。我們這般研究文學的人，對於國家的興亡，應該負有相當的責任。……我們應該睜開眼睛，看透中國現代的國情和環境，究竟需要那一種文學。……我在這兒大聲疾呼的，斬釘截鐵的向著愛國的有為的青年說：現在中國需要的文學，是國家主義的文學。」

他接著勉勵中國的青年作家，做詩人要做義大利的熱血詩人鄧南遮，寫小說就要寫都德的《最後一課》，這些作品使人讀了，會興起一股悲壯的愛國熱情，而那些花兒草兒醉生夢死的戀愛言情作品，都應該燒掉毀掉。他舉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對祖國改革的雄圖，提到「人心的大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努力的「全民革命」，大杰強調看了易卜生的話，才知道文學家對於國家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了。大杰最後講到他和胡雲翼在信中提及，將來中國的文壇，將分為純文學、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三派，但他更堅信國家主義派文學，是中國文學未來主流之大勢所趨。

說到國家主義文學的偉大將來，大杰認為要我們自己來創造，他信心無比的呼籲：「青年們！祖國的嗜好文藝的青年們，我們以後要正式樹起國家主義的旗幟來談文學。我們的主張，是真的有目的的國家主義的文學。這種文學，形式是寫實的，內容是國家主義的。那些充滿了淫慾的悲觀的虛偽的無目的的東西，我

們應該排斥和驅逐。」大杰以戰鬥之姿的口吻說：「青年們！你們有和我們表同情的，以後我們就互相努力，有反對的，以後同在疆場上相見！」

未幾，在《醒獅週報》第 102 號，大杰續寫〈文學家與國事〉，為其〈國家主義文學論〉一文之補充。在該文中，大杰歷舉世界偉大思想家、大文豪，如英國莎士比亞、義大利鄧南遮、德國菲西特與霍卜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等巨子為例，當其祖國有難時，他們是如何的以作品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激發國人的戰鬥意志，和欺凌的列強、和腐敗的勢力抗爭周旋到底；有的甚至還親上戰場與敵人拼搏，這種替祖國犧牲一切的精神，比什麼都要光榮。

大杰回溯中國古來的文學家，大都孤標傲世，不屑與聞國事，嘯傲風月，寄情山水，以高潔自我標榜，以隱逸避世為清高。如陶淵明、孟浩然、蘇東坡、納蘭性德、曹雪芹之流均如是。這樣的文學家，都是唯美主義，賞樂主義的代表，其作品自然也完全是唯美、賞樂主義的作品。大杰稱這些文學家的作品，說不到是人生的藝術，也非有目的之藝術，而是一種無目的的藝術。此無目的之藝術，在中國可謂綿延已久，它們產生了無數作家與作品，但充其量只是一種「貴族的藝術」。

大杰說這種「貴族的藝術」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不行的，在列強侵略下的中國是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為中國以前，無論如何並沒有動搖國本，但現在的中國可不同了。他說：「可愛的祖國，已到了快要滅亡的時機，祖國的同胞，都有做他人奴隸的危險。任你是一個怎樣的孤標傲世的文學家，亡國以後，再偉大，也不過是太戈爾的兄弟了。」所以他期許，現在的文學家，要知道自己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比其他人來得重，因為文學家又比他人，對時代來得更敏感。

大杰聲嘶力竭的呼籲「親愛的青年！愛好文藝的青年！快快睜開眼睛，看看中國到了怎樣的危急。唐宋元明清，都過去了。中國現在需要的文學家，不是唯美主義賞樂主義的文學家，需要的作品，也不是那些充滿了情慾的無目的的作品。我們不幸生在這個病時的中國，萬幸又做了二十世紀的青年。二十世紀中國再造的責任，當然歸我們這般青年負擔。再造中國的無限的光榮，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希望」。

是以大杰慷慨激昂的鼓舞青年作家道：「文學家對於國事，誰說不負責任。一壺酒，一樹花，看花飲酒，醉後高眠的時期過去了。現在的中國，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到了列強侵略的中國。到了快要消沈的中國。聽呵！葬鐘又在敲了！葬鐘又在敲了！勇敢的文士！熱血的詩人！起來罷！起來罷！」直把文學家與知識份子的角色，和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中國當時之處境，作有效及必要的連結，而此一連結之臍帶，以大杰觀之，就是倡導積極愛國的「國家主義文學」。

基本上，大杰之所以參加青年黨，以及他熾熱的愛國情操，和同時代的聞一多參與「大江會」，強調愛國至上的情形相類似。他們除了強烈愛國心外，身處異國遭受輕視的悲憤情結，可能更是主因。聞一多留學美國，遭受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已難以忍受；何況大杰留學彼時侵略中國最甚的日本，那種遭賤視的感覺，更是錐心刺骨之痛。在《醒獅週報》第 106 號的「文藝特刊」，他發表一篇名為〈寄祖國的青年們〉，將此心跡沈痛的表露出來。

他說：「在國內住著，雖處處感著軍閥的專橫，帝國主義的殘暴。但每天所看見的，總還是祖國的碧水青山，總還是祖國的兄弟姐妹。腳一踏到異國的土地，尤其是這個處處遭人白眼的日本，你更要感到你纔真是亡了國的旅客。」大杰之言，如同聞一多在美國寫的家書言：「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

所能形容。俟後年年底我歸家度歲時，當與家人圍爐絮談，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積憤。」此一辛酸，誠如梁實秋在《談聞一多》書中所評論的「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在失掉自由的時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貴，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時候才最能體會到平等之重要。年輕的學生到了美國，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甘心媚外、數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懷有強烈的愛國心。」

在敵國的屋簷下，大杰深有所感的說：「只要有一點人心，只要有一點情感，對著黃昏時候的晚霞，望望故國的煙霧，對著海水波中的明月，望望祖國的江山，再想想自己在異國所受的人家的白眼，所聽的諷刺的笑聲，你的火熱的淚珠，會暗暗地滴滿你的衣袖。」大杰接著以安南的妓女尚且有愛國情操，中國的青年豈可麻木不仁；外國人都熱愛自己的國家，中國青年怎能頹靡消沈。義大利的青年運動成功了！土耳其的青年運動成功了！有四千年文化歷史的光榮的中國，怎忍坐視中國的消亡呢？所以他以寄給曾琦的一首詩「今當世亂紛爭日，正是男兒破浪時！沙場一洒頭顱血，世上方知有健兒！」與所有中國青年互勉，要救中國捨我其誰。

1926年5月，適值「五卅慘案」一週年紀念，大杰摯友胡雲翼於《醒獅週報》第84、85號兩期，發表〈國事千鈞重〉對話劇，透過劇中杜一萍、董筠秋夫婦的對話，道出中華男兒在面對列強欺凌時，國事千鈞重但是勇於承擔的革命愛國熱誠。雲翼的對話劇勾起了大杰為文相呼應的動機。其後，他也在《醒獅週報》第112期發表〈頭顱一擲輕〉獨幕劇以為烘托。在前言中，大杰談到「近來愛情與國事的心情，時時在心中上下。我想現在要是牽著愛人的手，在快要滅亡的中國的江濱散步的時候，未必能夠感到真正的愛情的驕傲與光榮。就是做了得了諾貝爾獎金的世界著名的太戈爾詩人，也不過是一個印度亡國奴的種子。」因此在胡雲翼〈國事千鈞

重》刊載後，於崔萬秋的敦促下，大杰也寫了〈頭顱一擲輕〉以為助陣。內容以奉勸青年，宜拋開兒女私情，獻身報效國家為主旨；其後在該刊發表的獨幕劇〈侮辱〉，敘述僑民在國外遭受欺凌虐待之事，亦仍延續此種喚醒國人，愛國自強之風格。

當然，大杰堅定不移的「國家主義文學論」之主張，也引起一些反對的聲浪，同為湖南人，時已在《小說月報》撰稿的黎錦明，即曾為文批評他。但大杰不僅不為所動，反而針鋒相對的在《醒獅週報》第 115 號，以〈淺薄的批評者〉予以反擊。文中除指責黎氏不明瞭一件事的究竟，就喜歡提筆來批評人家外，仍不改初衷的為自己「國家主義文學論」之主張作辯護。大杰一再強調，「我們對於文學的主張，是不變態的，我們唯一的主張，就是攻擊中國現在的充滿了淫慾的無目的的文學，我們願走出象牙之塔，來建設一種有目的的文藝。」職是之故，他還預告其與黃仲蘇、胡雲翼等志同道合之士，準備於 1927 年 2 月擬出版《青年文學週報》，由黃仲蘇負責編輯，胡雲翼總管事務，以積極推動他們「國家主義文學」的理論和主張。

基本上，大杰的國家主義文學論，主要見諸其在《醒獅週報》的三篇文章。除上述二文外，1927 年元月 22 日，大杰於《醒獅週報》第 120 號，刊布其〈文學與國家〉一文。強調當今世界，輿論的影響力非常之大，因此要讓世界瞭解中國，不是靠政治上的宣傳，和武力的壓迫可以成功的，而是要靠文學的輿論。他說，文學輿論力量的偉大，真是不可思議，往往一兩句詩，或是一篇短篇小說，就可以得知你這個民族的全部。

大杰說，或許有人會認為他言過其實，但須知各國的文學作品中，即蘊含各國的民族性。一個偉人或一個他樣的人，不能代表他們普遍的民族性，能夠把普遍的民族性，暴露在世人身前的，就是文學。大杰以俄日兩國為例，提到英法等文明國家，以前對這兩個